

社會之眼

NO.2 2018 十二月發行

龍鷹惡鬥！ 解析美中貿易戰根源

傳記文學 副社長／溫洽溢



 龍騰文化

55701N3/B/000000

龍鷹惡鬥！解析美中貿易戰根源

美中貿易逆差的趨勢

1972 年，隨著尼克森總統打開中國的冰封大門，美中關係開始重啓經貿與文化交流（照片一）。該年，美國從中國進口 3,240 萬美元的商品，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達 6,350 萬美元。美國早期對中國的經貿關係，其實主要是基於地緣政治的考量，寄望建構拉攏中國以抗衡蘇

聯的戰略。然而，四十年後，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幾乎高達 3,000 億美元，中國已經成為美國最大債權國、消費品的主要進口國（表一）。中國對美國享有的龐大貿易順差，長期以來已經成為美國朝野關切的議題。

▼表一 中國對美國的貿易（2000～2011 年）

單位：10 億美元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美國出口 變化 %	16.3 23.9	19.2 18.3	22.1 14.7	28.4 28.9	34.7 22.2	41.8 20.5	55.2 32.0	65.2 18.1	71.5 9.5	69.6 - 2.6	91.9 32.1	103.9 13.1
美國進口 變化 %	100.1 22.3	102.3 2.2	125.2 22.4	152.4 21.7	196.7 29.1	243.5 23.8	287.8 18.2	321.5 11.7	337.8 5.1	296.4 - 12.3	364.9 23.1	399.3 9.4
美國貿易逆差	- 83.8	- 83.0	- 103.1	- 124.0	- 162.0	- 201.6	- 232.5	- 256.3	- 266.3	- 226.8	- 273.1	- 295.5

參考資料：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照片一 1972 年美國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由左二開始依序為周恩來、尼克森、江青）（圖片來源：達志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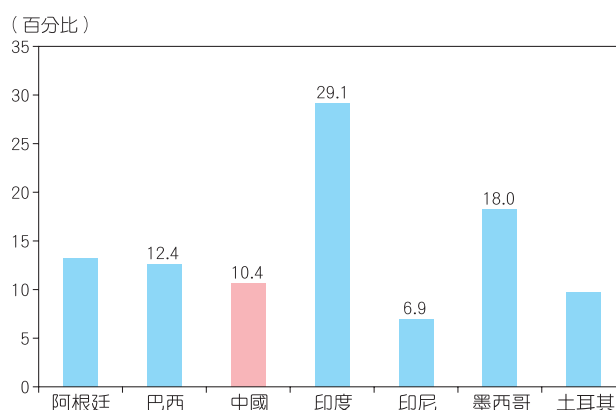
美中貿易糾紛的焦點

美國觀察家普遍認為，中國政府在國際貨幣市場上刻意壓低人民幣幣值，造成人民幣幣值嚴重低估，有利於中國產品出口的競爭優勢，實質上是一種政府對本地製造業出口的變相補貼政策。隨著美國的失業率飆升、就業機會大量流失，人民幣匯率經常成為爆炸性的政治議題。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研究員、也是重量級的中國經濟研究學者拉迪（Nicholas Lardy），長期關注人民幣匯率問題。根據他的研究，隨著人民幣幣值的升高，中國國際收支盈餘仍然在增長（表二）。這個結論證明，即使人民幣升值，也並未減緩中國出口的趨勢（註1）。

此外，也有美國學者把美、中貿易逆差問題歸因於中國重商主義的封閉政策，批判中國政府在制度上對外國企業進入本地市場設立重重障礙，並且大力扶持國營企業。有關中國經濟對外開放程度，美國經濟學家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面向來衡量：（1）中國與其他發展國

家進口關稅率的比較；（2）中國政府要求進口許可或數量限制之商品種類的數量；（3）進口占 GDP 的百分比（註2）。

首先，根據統計，與其他開發中國家比較，中國的平均進口關稅稅率相對較低。2004年，中國執行的進口稅率是 10.4%，印度、墨西哥、巴西和印尼分別是 29.1%、18.0%、12.4%、6.9%（圖一）。



參考資料：陸國強等（譯）（2008）。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著。帳簿中國：美國智庫透視中國崛起。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P.98。

▲圖一 應用關稅率，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2004 年）

▼表二 人民幣／美元的匯率及美國貿易赤字（2000～2011 年）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匯率、人民幣／美元 增值率 %	8.28 0.0	8.28 0.0	8.28 0.0	8.28 0.0	8.28 0.0	8.07 2.5	7.80 3.3	7.29 6.5	6.82 6.5	6.83 0.0	6.60 3.3	6.29 4.6
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 差（10 億美元）	83.8	83.1	103.1	124.1	162.3	202.3	234.1	258.5	268.0	226.9	273.1	295.5
參考資料：U.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h10/hist/dat00_ch.htm ; U.S. Census Bureau, 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 .												

註 1：Morris Goldstein and Nicholas R. Lardy(2009), “The Future of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 in *Policy Analys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7,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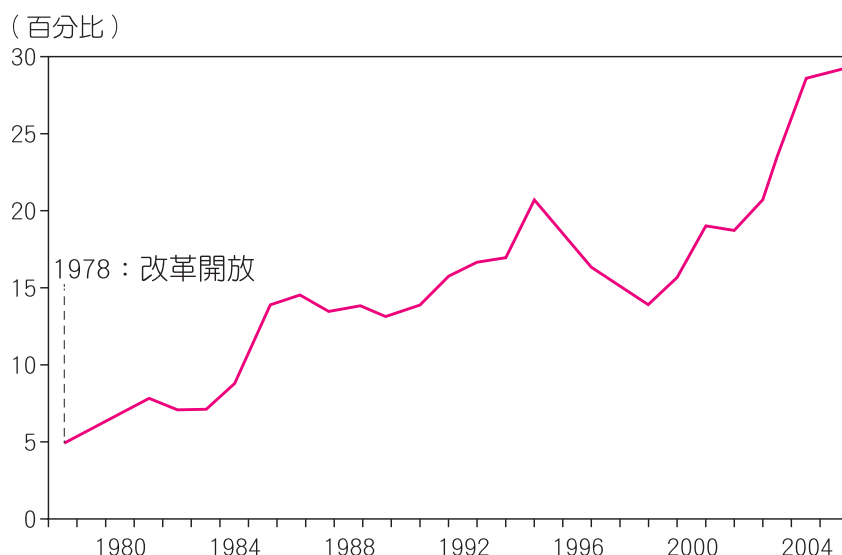
註 2：這方面的探討，詳見陸國強等（譯）（2008）。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著。帳簿中國：美國智庫透視中國崛起。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p.96～101。

其次，自從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照片二），中國政府要求進口許可或數量限制之商品種類的數量，也急遽調降。從加入 WTO 前，中國政府對近一半進口商品設定許可要求的高峰期，到加入 WTO 前夕，調降為不到 4%。

最後，中國進口占 GDP 的百分比，從 1978 年中國改革開放起始的 5%，到了 2005 年急遽增加為 30%（圖二）。這個比率是美國的二倍，日本的三倍多，同時也遠超過其他幅員遼闊的開發中國家，如阿根廷、巴西、印度等。所以，傳統重商主義限制進口的做法，事實上並未反映在中國的貿易體制上。



▲照片二 中國於 2001 年 12 月 11 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中國郵政所發行的紀念郵票



參考資料：陸國強等（譯）（2008）。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著。帳簿中國：美國智庫透視中國崛起。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P.100。

▲圖二 進口占 GDP 的比率（1978～2005 年）

▼照片三 世界貿易組織位於瑞士日內瓦的總部





▲ 照片四 位於中國的勞力密集產業工廠內部人員作業情形

後冷戰時代全球供應鏈的重組

相對於上述因素的種種爭辯，美國學者普遍比較認同，中國對美國享有的龐大貿易順差，事實上是反映了全球供應鏈重組的現象（註3）。

後冷戰時代，隨著蘇聯及東歐共黨集團的垮臺、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及資訊科技的發達，使得愈來愈多的產品製造可依地緣彈性分布，將某些產品零件轉移到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來生產。上個世紀的九〇年代，隨著日本、韓國、臺灣、香港等生產成本的節節上漲，它們將玩具、電子產品、成衣、紡織品、鞋類等勞力密集產業和輕工業，紛紛轉移到勞動力

和生產成本相對低廉的中國（照片四）。製造的產品再以「中國製造」的名義輸往美國市場。從這種全球供應鏈重組的架構來觀察中國對美國所產生的鉅額貿易逆差現象（圖三），儘管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在 GDP 所占的百分比）大幅攀升，但美國對東亞國家的貿易赤字相對是在下降，一增一減，相互抵銷。總體而言，美國對亞洲國家貿易赤字占 GDP 的比率，其實是相對穩定的。

從這種全球生產鏈轉移的架構來觀察美、中兩國的貿易逆差關係，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和討論。

▼ 圖三 美國的貿易逆差，依地區畫分



註 3：Susan L. Shirk（2007），*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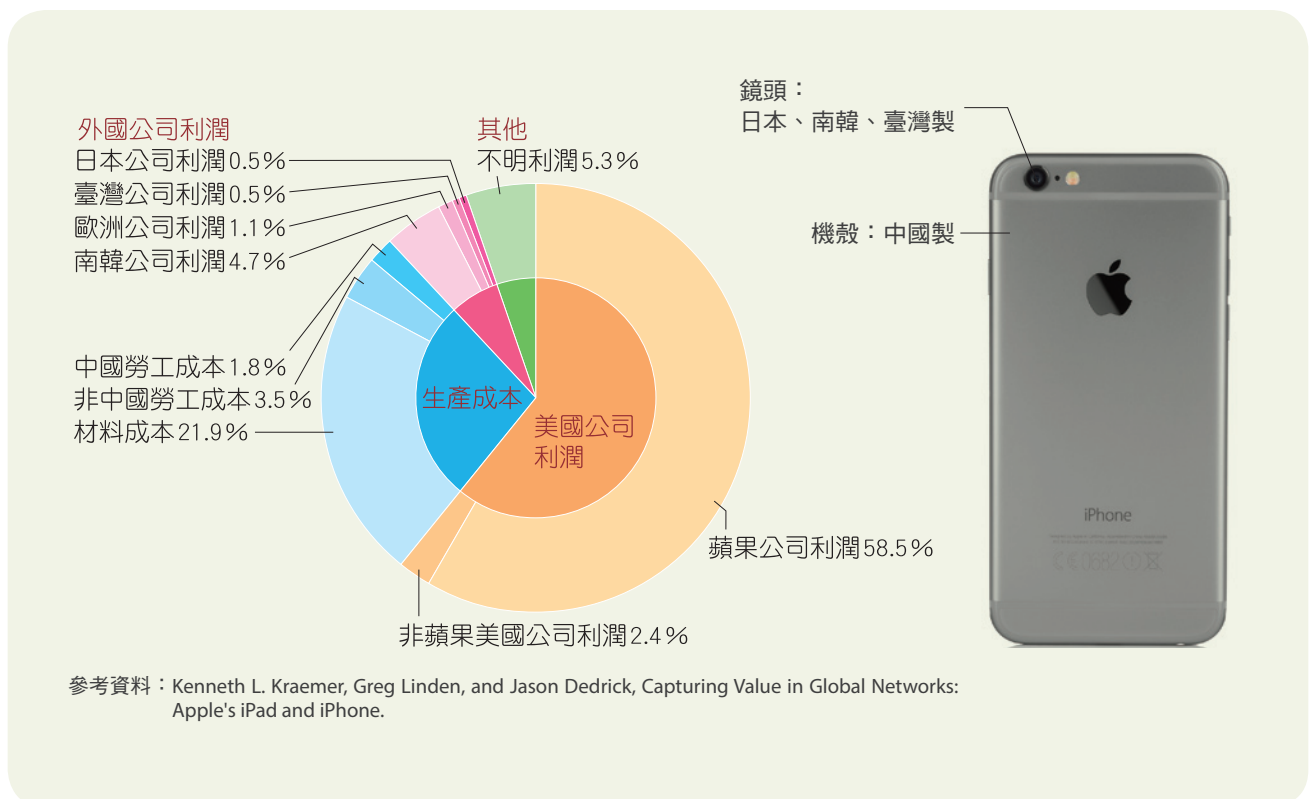
首先，後冷戰時代富有彈性活力的全球生產鏈，使得雙邊貿易、甚至是區域貿易的統計數據顯得毫無意義。因為美國海關的統計方法，一律以產品的最終組裝地為標準，從中國出口至美國的商品全都算在美國對中國的貿易統計數據上。但是，美國消費者購買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其實是加工貿易商品，該商品可能包含日本、韓國、臺灣、香港等的技術，甚至該商品的智慧財產權是由美國人擁有，價值可能遠遠高過中國人所賦予的價值。

其次，美國不少跨國企業也加入了這一全球生產鏈，是全球化彈性生產模式的受益者，例如：蘋果公司。2011年，克瑞瑪（Kenneth L. Kraemer）、林登（Greg Linden）及德瑞克（Jason Dedrick）三位教授對蘋果公司明星級產品 iPad、iPhone 的利潤分成做了一項有趣的研

究（註4）。他們的研究發現，一般認為蘋果的產品在中國組裝，中國供應生產所需的大部分電子零件，所以應該獲得較多的利潤；但是，事實上，中國勞工僅僅獲得組裝或生產零件的微薄薪資，在中國生產電池與觸控螢幕的公司，大多為外國人所持有，而美國的蘋果公司最終占有最大比例的利潤（圖四）。蘋果公司的彈性生產流程，印證了全球生產鏈重組的現象，並且從中獲得最大的利益。

再次，中國出口對美國所創造的鉅額貿易順差，轉為美元儲備，主要被用來購買美國國債。中國自從 2000 年以來，外匯儲備顯著增加，到了 2011 年 6 月，已經高達 3 兆 2,000 億美元，占世界總量的三分之一。中國的外匯存底主要是用來購買美國國債，2008 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國。2012

▼圖四 iPhone 的價值分配比率（2010 年）



註 4：Kenneth L. Kraemer, Greg Linden, and Jason Dedrick, "Capturing Value in Global Networks: Apple's iPad and iPhone", in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65187229_Capturing_Value_in_Global_Networks_Apple's_iPad_and_iPhone.

年 2 月，中國持有美國國債高達 1 兆 1,780 億美元（美國國債第二持有國日本，持有美國國債為 1 兆 959 億美元）（照片五、照片六）。

儘管中國並非美國的軍事同盟，其戰略利益甚至與美國「同床異夢」（註 5），但中國就像美國的同盟如日本、臺灣等，以高額的貿易順差及高儲蓄率累積龐大的外匯存底，再用以購買美國的國債，成為美國的債權人，與美國緊密結合，形成一種相互依賴的關係（表三）。這一結果，套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學者孔誥烽（Ho-fung Hung）所做的評論：

註 5：美、中兩國戰略利益的分合，詳見 David M. Lampton（2002），*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照片五 2017 年 12 月，位於美國紐約的國債鐘，顯示美國國債總額已超過 20 兆美元



▼表三 前 5 名國債持有國和地區的美國軍事基地大小排名

1988 年		2000 年		2009 年	
前 5 名國債持有國和地區	軍事基地大小排名	前 5 名國債持有國和地區	軍事基地大小排名	前 5 名國債持有國和地區	軍事基地大小排名
日本	3	日本	2	中國	n/a
德國	1	英國	5	日本	3
英國	4	中國	n/a	巴西	n/a
加拿大	n/a	德國	1	俄羅斯	n/a
比利時	16	臺灣	n/a	臺灣	n/a

註：美國軍事基地大小是依據駐紮在該國的軍事人員總人數而定。
參考資料：沈莉（譯）（2016）。Ho-fung Hung 著。中國為何不會統治世界。北京：中信出版集團。P.138。

▼照片六 美國財政部的職能包含管理美國國債



美國對亞洲出口產品的需求不斷提升，由此也使得這些亞洲國家經濟體用貿易帶來的美元購買更多的美元國債。這兩個相輔相成的進程，不斷加深東亞對美國市場和金融的依賴。亞洲對低效益率的美國國債的大規模投資，無異於在做一場巨大的進貢，通過把亞洲的儲蓄轉化成美國人的消費能力，從而延長美國的繁榮（註6）。

中國購買美國國債「成癮」，因而被吸納進美元貨幣體系，主要原因和中國的貿易結構有關。誠如上述，隨著後冷戰時代全球生產鏈的重組，中國已經成為東亞貿易生產網絡的中

心。來自東亞地區與其他開發中國家的原物料、機械設備、零件在中國組裝，然後出口到美國和歐洲（照片七）。中國對外貿易總體順差雖然持續增長，但是如果扣除對美國和歐洲的順差，就會出現貿易赤字的現象（表四）。這就意味著美國和歐洲成為中國貿易順差的唯一來源，而對東亞地區與其他開發中國家的出口金額，並沒有超越從東亞地區與其他開發中國家進口原物料、機械設備、零件的數量。

註6：沈莉（譯）（2016）。Ho-fung Hung 著。中國為何不會統治世界。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P.142。

▼表四 中國對不同經濟體的貿易收支平衡情況

單位：10 億美元

	2005 年	2010 年
世界	92.0	143.3
美國	145.4	201.2
歐盟	91.1	154.9
巴西	— 5.1	— 13.7
日本	— 34.1	— 79.3
南韓	— 48.8	— 79.5
中東	— 8.3	— 23.2
非洲	— 3.3	— 5.5
澳大利亞	— 3.4	— 29.6

參考資料：沈莉（譯）（2016）。Ho-fung Hung 著。中國為何不會統治世界。北京：中信出版集團。P.147。

▼照片七 中國最大貨櫃港：上海洋山深水港





▲ 照片八 位於廣東省深圳經濟特區的一間時鐘工廠。深圳於 1980 年成立經濟特區，大量外資的進駐，為這個南粵農村帶來巨大的繁華改變

🔍 中國的發展戰略與外國直接投資 (FDI)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融入後冷戰時代全球供應鏈重組的網絡，進而對美國造成鉅額的貿易順差，乃至中國的崛起和發展，都與中國改革開放後所採取的發展策略息息相關。

1978 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經濟規劃與制度仿效自前蘇聯的「蘇聯模式」(Soviet Model) 策略，主要特點是：首先是「重重輕輕」的產業布局，即重視重工業，輕視輕工業。其次，在經濟運行方面，採取「指令性經濟」的型態，政府擁有工業、運輸、通訊等各大型企業，透過農業集體化，控制農村土地所有權和農業政策；由政府透過計畫經濟規劃企業生產指標，分配各企業所需的生產物資，取消價格機制的資源配置作用；共產黨壟斷政治權力，通過對人事制度的全面控制，監督經濟的運作（註 7）。

蘇聯模式雖然讓中國在 1949 年之後以迅速集中資源，達到工業化的目標，不過，這種

模式所隱含的效率不彰、生產力落後等弊端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一浮現，加上毛澤東時代派系政治鬥爭所引發的社會動亂，造成經濟的凋敝落後。1978 年中共召開第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啓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當時，中國的基本條件是「人口多、底子薄」，亦即擁有充沛的勞動力，但是缺乏先進的技術和充足的資本，同時消費能力不足。鄧小平所主導的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就是將中國的條件截長補短。首先，以農業承包制度取代農村集體化，提高農民生產誘因，釋放中國農村的龐大勞動人口。其次，在廣東、福建設立「經濟特區」，吸引外國的科技技術和資本，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生產以出口為導向的輕工業和電子產品，銷往國外市場（照片八）。最後，在市場機制逐步深化、利益與權力重新分配的過程中，仍然維持共產黨的政治權威，以穩定政治和社會秩序。中國這種經濟市場化與政治威權統治的矛盾結合，即所謂的「中國模式」(China Model)（註 8）。

註 7：Barry Naughton (2007),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註 8：有關中國模式政治與經濟制度的探討，詳見丁學良 (2011) 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Daniel A. Bell (2015), *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事實上，「中國模式」並非中國的獨特發明，誠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學者黃亞生（Yasheng Huang）的分析，中國模式發展策略類似於日本、南韓、臺灣的經驗，即經濟學家韋德（Robert Wade）所謂的「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模式，都曾經歷過成功的土地改革，經濟發展以出口為導向，控制金融體系等（註9）。

儘管中國模式烙印上東亞發展型國家的深深印記，相較於東亞發展型國家，中國模式還是存在兩大關鍵性差異。第一，根據資產與營收占 GDP 的比率來看（表五），中國經濟雖然存在私營部門，但卻是以國營企業為主體。根據 2014 年財星（Fortune）全球五百大的報告，上榜的 40 家中國企業中，有 35 家是國營企業，包括 3 家名列前十大的：中國石油化工公司（Sinopec）、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CNPC）（照片九）、國家電網公司（State Grid）。

第二，中國經濟發展對大量「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的依賴（註10）。

▼表五 世界最大國有部門：國營企業資產與營收占 GDP 百分比（2011 年）

國家	資產（%）	營收（%）
中國	145	26
印度	75	16
俄羅斯	64	16
南韓	48	7
巴西	51	12
法國	23	8
印尼	19	3

參考資料：Arthur R. Kroeber（2016），*China's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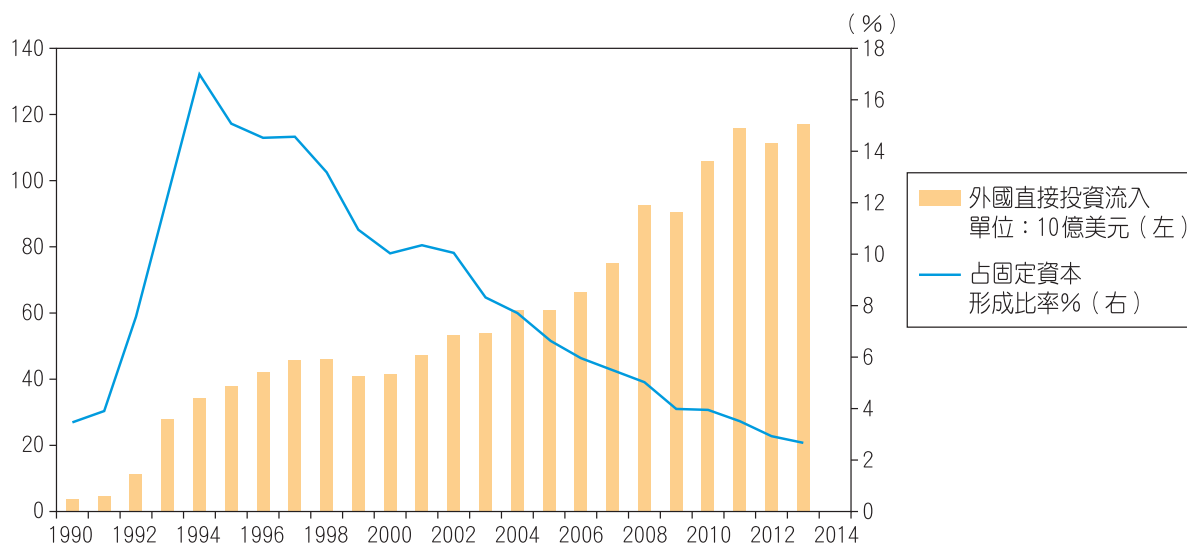
註9：黃亞生（2011）。「中國模式」到底有多獨特？。北京：中信出版集團。

註10：Yasheng Huang（2003），*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照片九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位於雲南的加油站



▼圖五 流入的外國直接投資（1990～2013年）



參考資料：Arthur R. Kroeber, *China's Economy*, p.53.

外國直接投資主要是指用來直接投資工廠、設備，而不是收購公司股權的投資組合。面對中國改革初始條件缺乏資本、技術，這是一種迅速擺脫中國「底子薄」最便捷的方法。根據經濟學家馬藝豪（Arthur R. Kroeber）的分析，從 1985 到 2005 年，中國平均每年流入的外國直接投資將近占了 GDP 的 3%，相較於南韓、臺灣成長高峰期的 0.5%，日本不到 0.1%，是非常高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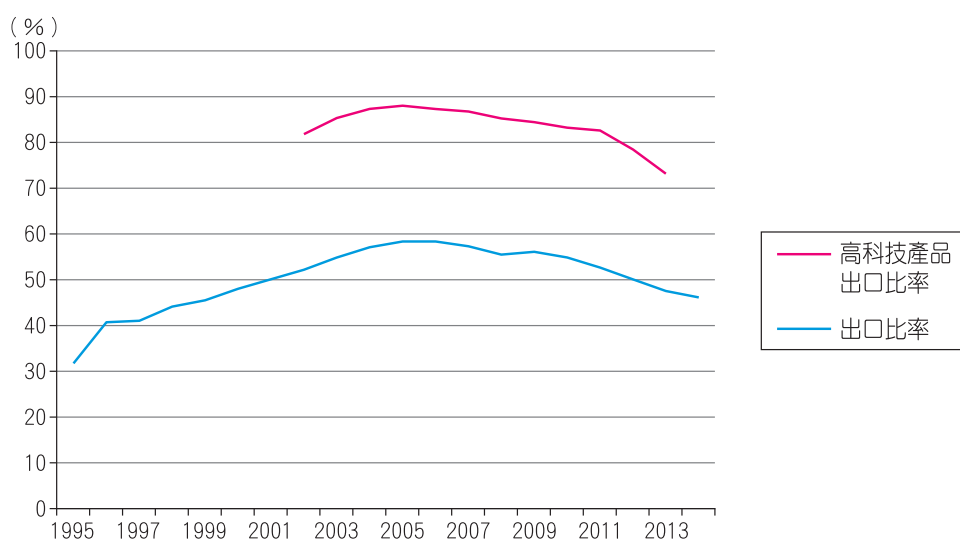
1990 年代初，以及 2000 年初加入世界貿易

組織，是中國在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轉折期（圖五）。前者，主要是因為鄧小平南巡發表有關改革政策的重要講話，消除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之後外界對黨內派系鬥爭造成經改政策掣肘的疑慮（照片十）。至於後者，中國加入 WTO 之前，美國國會每年都會針對是否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資格進行討論，宗教、人權、政治各類團體時常參與其中，增添許多不確定因素。中國加入 WTO 後，美國給予中國永久的正常貿易關

▼照片十 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象徵中國改革開放進入下一階段（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圖六 外資企業占出口的比率



參考資料：Arthur R. Kroeber, *China's Economy*, p.54.

係，則讓投資中國的出口業者更為安心。

外國直接投資在中國的出口貿易尤其具有重要的功能。相對於日本、南韓、臺灣這類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型國家，其出口幾乎全由本地公司生產，中國則大多由外國企業製造。根據統計，自 1990 年代初以來，中國三分之一以上的出口產品是由外國企業製造，2005 年這個比率達到高峰的 58%。中國政府所認定的高科技產品，外國企業生產的比例更高。從 2000 年代初

到 2012 年，超過 80%（圖六）（註 11）。前述蘋果公司的利潤分成比例即清楚證明這一數字的意義。中國已經是世界電子產品的主要出口國，但是高價值、高科技技術的零組件，還是牢牢控制在蘋果、三星、英特爾（照片十一）、微軟等全球企業巨擘的手裡。

註 11：Arthur R. Kroeber（2016），*China's Economy: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52 ~ 56.

▼照片十一 英特爾是世界最大的半導體公司，掌控微處理器的核心技術





▲ 照片十二 原先受美國制裁的中興通訊，後來與美國商務部達成協議，解除中興向美國供應商採購零組件的禁令

產業政策與市場准入

中國雖然透過「中國模式」策略擺脫貧窮，促進經濟發展，但是根據前述，中國的「加工貿易」，亦即從國外進口原料與零件，在國內進行組裝，然後再出口到海外市場，技術含量較低，必須仰賴進口。在當今中國企業之中，創新企業仍舊屬於少數。這使得中國製造業的發展，面臨了技術障礙的瓶頸。

2016 年，中國進口了總值 2,280 億美元的 IC，超過石油進口的金額。2018 年，美國川普政府制裁世界第四大的通訊設備製造商「中興通訊」（ZTE）（照片十二）。中興通訊生產

通訊設備所需的關鍵零組件，其中包括提供其無線電台動力的微晶片（microchip），完全仰賴美國公司的供應。制裁的結果，幾乎讓這全球第四大通訊設備製造商的運作癱瘓。長期以來，中國也希望透過併購美國的科技公司解決技術受制於他人的窘境，但是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的理由，就像過去反對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欲併購美國優尼科石油公司（Unocal）一樣，否決了 13 億美元的萊迪思半導體公司（Lattice Semiconductor）、24 億美元的快捷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的交易案，使得中國期望藉由併購美國高科技公司提升技術的努力徒勞無功（註 12）。

註 12：Adam Segal, “When China Rules the Web: Technology in Service of the State,” in *Foreign Affairs*, Vol.97, No.5 (Sep/Oct 2018), p.10 ~ 18.



▲ 照片十三 中國首屆國際智能產業博覽會於 2018 年 8 月 23 日至 25 日在重慶舉行。它展示了中國在「中國製造 2025」政策下的最新技術發展，包括 AI、機器人、5G 等

事實上，早在胡錦濤時代，中國就已經意識到技術創新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2005 年，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闡釋中國長期的經濟繁榮，必須奠定在知識與效率的經濟基礎上，必須要讓勞動力密集的產業升級。2006 年，中國政府隨即提出「自主創新」政策，目標要在 2020 年之前使中國進入创新型國家的行列。這項政策綱領也提到，要將全國研發的投入提高到占 GDP 的 2.5% 以上，對外科技依存度降到 30% 以下，發明專利年度授權量與國際科學論文被引用數進入世界前五大（註 13）。

到了習近平時代，中國受到德國工業 4.0 的啟發，於 2015 年野心勃勃提出「中國製造

2025」計畫，欲將中國從製造大國推進為製造強國。中國這項計畫的主要方針「創新啟動、質量為先、綠色發展、結構優化和人才為本」，重點工程涵蓋：資訊產業、航空科技、人工智能（照片十三）、綠能科技、生醫器械等（註 14）。就內容來看，「中國製造 2025」計畫本身更具有濃厚的科技民族主義色彩。根據統計，中國目前製造業的技術對外依存度高達 50%，80% 以上的晶片是來自進口。該項計畫的目標，要在 2025 年之前，在工業需求晶片方面達到 70% 的自製率，中國政府並且承諾自計畫實施之後的未來十年，將挹注 1,500 億美元用以改善中國設計與製造晶片的能力。由此看來，中國對科技政策，相

註 13：Charles W. Freeman III, "The Commerci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hip", in David Shambaugh, ed., *Tangled Tita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198.

註 14：吳歡歡（譯）（2018）。Ulrich Sendler 主編。無邊界的工業革命：德國工業 4.0 與「中國製造 2025」。北京：中信出版集團。

對於創新，更為強調自主性，希望中國的製造業能夠擺脫對外國技術的依賴。中國的科技民族主義傾向，已經引發美國川普政府的關注與重視。據分析，美國政府制裁中興通訊，甚至試圖自加拿大引渡華為公司財務長孟晚舟，是美國對中國所發動的科技預防戰爭。

中國政府不僅提出經濟發展的計畫目標，同時還以產業政策規劃方式，鼓勵某一個產業的發展而限制另一個產業。中國每年都會出版「投資目錄」，目錄內容將產業區分為「鼓勵」、「限制」和「禁止」三大領域。這份目錄就成為地方政府招商的指南，凡是受到「鼓勵」的產業，例如：高科技或者能夠創造大量就業機會的產業，就會得到相應稅收、土地使用和簡化管理手續的種種優惠。根據狄忠浦（Bruce Dickson）的研究，中國扶持本地企業與美、日公司競爭的技巧，已經到了高超藝術的境界。中國公司每每能以「愛國主義」作為而受到政府的眷顧，中國政府的偏袒作法，已經引起歐美跨國企業經常的抱怨抗議，近年來這種現象在綠能產業領域（照片十四）表現得尤其明顯（註 15）。

貿易戰的政治邏輯

根據上述的分析，美國對中國形成鉅額貿易逆差與美、中兩國之間的貿易糾紛，其實是一個陳年的老問題，並不是在川普時代才突然出現的。有關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採取重商主義的封閉政策等，是否是造成美國對中國形成龐大貿易逆差的因素，連美國經濟學家都有不同的見解。況且，從全球生產鏈重組的網絡來理解美、中貿易關係，誠如前述，可以清楚顯示：僅僅從兩國雙邊貿易數據是無法真實了解貿易結果的得與失，甚至，美國不少跨國企業都是這種全球貿易網絡的受益者。

中國的經濟繁榮，主要得力於美國所主導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亦即商品與資本自由的、沒有障礙地進行流通，是全球化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由於中國基於本身的國家條件，採取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策略，使得大量美元流入中國，讓中國不得不沉迷於美國國債，間接促進美國經濟的繁榮，從而步上日本的後塵，成為美元霸權的支柱，讓美國主宰全球政經體系。所

▼ 照片十四 上海的太陽能發電站。中國政府長期投資綠能產業並維持補貼政策，自十二五計畫開始更將綠能產業列為重點執政項目，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產國與消費國





▲ 照片十五 柏林圍牆倒塌象徵著蘇聯、東歐共產黨國家的垮臺，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強權（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以，儘管美、中兩國之間存在鉅額的貿易逆差，常常在大選期間成為政治人物、勞工組織、人權團體、宗教人士批評的焦點，但是也都從未成為兩國關係發展的嚴重障礙。況且，美國對中國貿易制度與政策的種種抨擊，如操縱匯率等，也都曾在其他東亞發展型國家的政策中出現。所以，美中兩國目前的貿易戰，深層的原因並不在於貿易制度與貿易政策的衝突。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在經濟方面確實融入全球化的體系，但卻並未產生美國人預期相應的政治質變。自從蘇聯、東歐共產黨國家垮臺，國際政治進入到後冷戰時代，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強權（照片十五），美國人始終堅定堅守自由國際主義的理念。自由國際主義認為：市場（對交換

的渴望）和民主（對社會認同的追求）都是源於人類的天性，將這兩種動力集結在一起，對於解決集體行動中複雜而普遍的困境來說，是最為行之有效的手段。經濟成長與政治民主之間存在必然的因果關係。

伊肯伯里（G. J. Ikenberry）認為，專制政體與資本主義之間存在深層的矛盾。首先，資本主義所孕育出的中產階級，為了追求自身的經濟利益，必然會挑戰封閉的經濟決策。其次，專制政體並無法提供經濟成長所需獨立自主的商業環境與法律效力。最後，資本主義促使專制政權轉化為多元的政體。民主與人權的價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及協商對話的多邊主義，最終將能締造國際秩序的穩定與和平（註 16）。

註 15：Bruce Dickson, "Updating the China Model,"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4, No. 4 (Fall 2011), p.39 ~ 58.

註 16：G. J. Ikenberry (2011),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自由國際主義將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的連結奉為圭臬，甚至成為美國在國際政治上的一種戰略手段。柯林頓時代的美國副國務卿塔爾伯特（Strobe Talbott）（照片十六）即明白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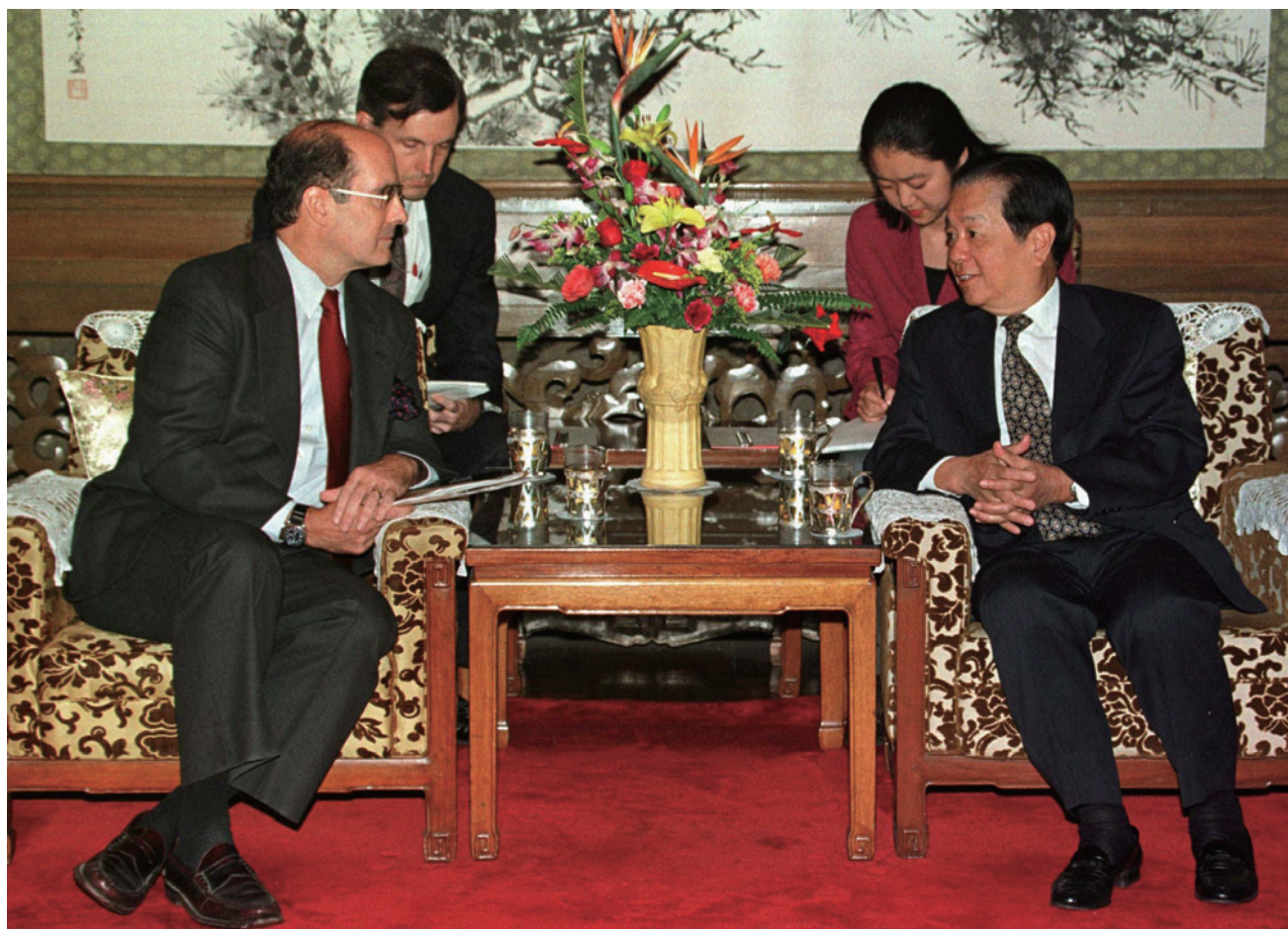
「中國願意擁抱地緣經濟，而放棄地緣政治。在商業利益的驅使下，與中國的競爭將是和平的博弈。中國將一改攪局者和革命煽動者的形象，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利益相關者乃至推動者。」（註 17）過去，美國完成與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美國跨國公司到中國投資，美國與中國的經濟互動接觸，往往就是基於自由國際主義的假設與期待，將中國融入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體系，以經濟利益約束中國的對外作為，同時促進中國的經濟成長與繁榮，藉由中產階級的崛起，激勵中國政治的民主轉型（註 18）。然而，中國經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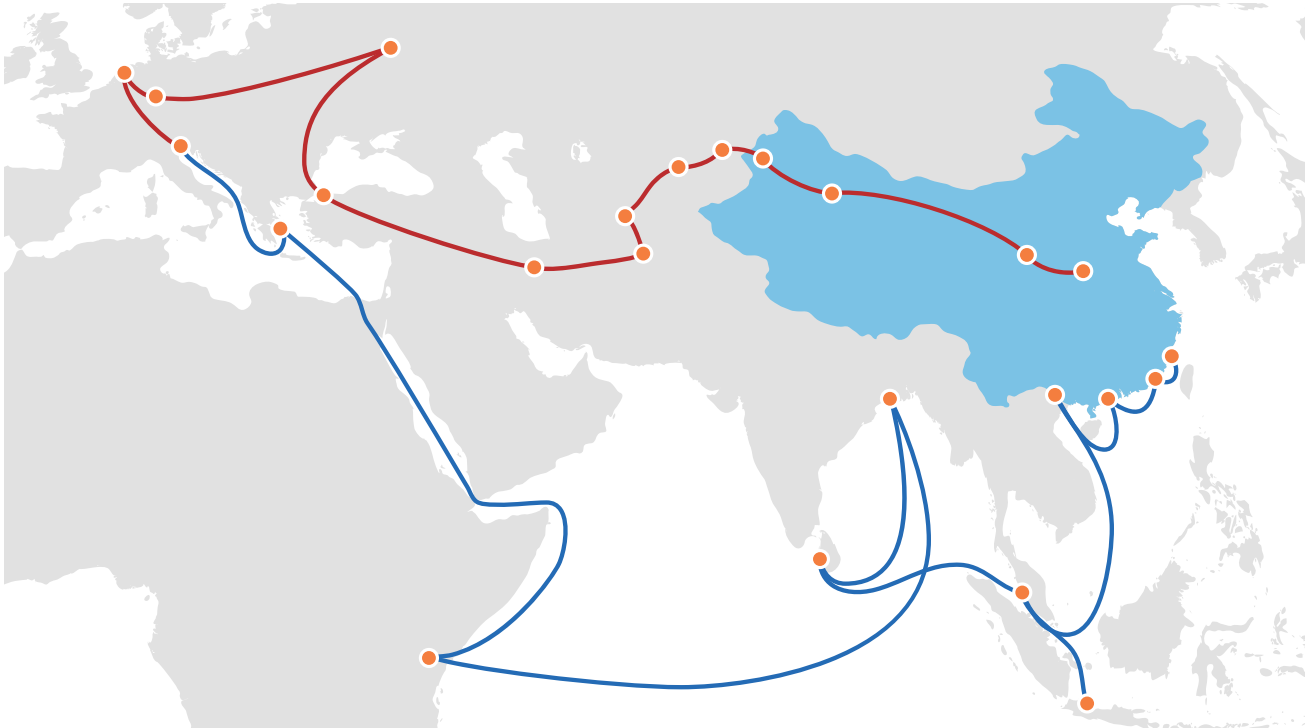
成長，並未如美國人預期的，出現民主政治的轉型，甚至在制度化方面更為倒退，包括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共產黨擴大對軍隊、社會、網絡的控制，強化意識形態的宣傳。

註 17：劉寶成（譯）（2018）。Hilton L. Root 著。國家發展的動力。北京：中信出版集團。p.68。

註 18：詳見 Jim Mann（2007），*The China Fantasy: Why Capitalism Will Not Bring Democracy to China*, New York: Penguin Books. 事實上，誠如前述，中國經濟目前仍是以國營企業為主體，國營企業形同黨國權力的延伸，重要國營企業領導階層的人事安排，皆由中共中央組織部所控制，國營企業領導階層是現行中國黨國體制的受益者。同時，中國模式對能源、土地、金融的絕對控制，遏制了私營企業主經營命脈。所以，改革開放後中國出現的資本家，不可能複製西方社會抗衡專制政治的經驗。有關中國企業家的獨特性，詳見 Bruce J. Dickson（2003），*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照片十六 美國副國務卿塔爾伯特（左）於 1997 年 11 月在北京會見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右）（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 圖七 一帶一路分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紅色）與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藍色）

不僅在內政上，在外交作為方面，中國也調整鄧小平「韜光養晦、不要強出頭」的戰略，轉而積極有所作為，提出許多與美國地緣政治利益相牴觸的政策，例如：「亞投行」的成立（照片十七）、提出「一帶一路」地緣經濟戰略（圖七）、釣魚臺與南海主權之爭。隨著 2008 年金融海嘯重創歐美，中國安然度過金融危機後，前美國副助理國務卿、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謝淑麗（Susan Shirk）評論道：「在中國國內出現過早的勝利主義（premature triumphalism）情緒，認為中國找到了所有問題的答案，中國領導人和民眾開始要求採取更為強勢的外交政策。在南海問題上，你尤其看到這一點。所以，那是一個轉折點。在這個更強勢和更有作為的外交政策上，習近平雙倍加碼了。」（註 19）美國與中國長期以來確實存在種種貿易糾紛，如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中國對外國企業的歧視等，但就謝淑麗來看，川普時代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戰，真正的癥結不



▲ 照片十七 亞投行目前已經有 87 個會員國

在於雙邊貿易制度與政策的衝突，而是根源於中國崛起之後對美國在國際政治與軍事方面所形成的挑戰，美國朝野兩黨對此似乎已經有了共識。貿易戰，其實就是國際政軍力量角力的延伸。

結論

美、中貿易戰方興未艾，雙方何時找到解決經貿糾紛的平衡點似乎仍是未知之數，但是，美、中經貿衝突的過程，還是有幾點值得關注的趨勢。

註 19：<https://www.voachinese.com/a/us-china-relations-susan-shirk-20181122/4669926.html>.

首先，後冷戰時代，美國標舉自由國際主義作為領導國際政治經濟霸權（hegemony）的正當性基礎，但是隨著川普政府揭櫫「美國優先」，走向單邊的保護主義政策，美國已經逐漸撤離全球化和自由國際主義。弔詭的，反而是半推半就被融入全球化的中國，是資本、商品自由流通的最大宣傳者、最大受益者。2017年初在達沃斯（Davos）世界經濟論壇，2018年4月召開的博鰲亞洲論壇上，與會發言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儼然以全球化旗手自居（照片十八）。面對川普政府來勢洶洶的保護主義主張，以及對中國祭出的貿易大戰，中國是否有能力組成一個反美國優先的親全球化的「正義聯盟」？

情況似乎並不那麼樂觀。中國要想登高一呼、團結親全球化聯盟，就必須徹底改革目前中

國模式的體制，大幅開放市場，調整市場准入和產業政策的歧視，以吸引外資對中國投資環境公平性的信賴。不過，這又牽涉到中國體制的根本改革，例如：對國營企業的重新定位，開放金融服務業等，對中國領導人而言，必然又是艱辛的歷程。另外，諷刺的是，儘管中國宣稱願意領導全球化聯盟，但是它卻依然針對南韓與澳洲採取關稅報復的政策（註20），而無視於這兩個國家有可能是這一聯盟的盟友（照片十九）。

另外，中國是否有能與美國進行貿易戰，持續採取以牙還牙的報復政策？例如：中國已經對美國進口汽車的關稅調升至40%，同時降低歐洲、日本、南韓的汽車關稅，從25%調降為15%，使得歐洲、日本、南韓生產的汽車，在中國市場享有相對美製汽車25%的優勢。

▼照片十八 2017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世界經濟論壇創辦人克勞斯·史瓦布的合影（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 照片十九 因中國與韓國的薩德問題，韓商樂天超市關閉在中國的分店

根據研究中國經濟學者諾頓（Barry Naughton）的評估，中國以牙還牙的報復政策似乎很難奏效。面對美國貿易戰的嚴峻挑戰，中國近來提出貨幣或信貸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三大宏觀經濟以爲因應，以作爲政策迴旋的空間。這間接承認，對美國採取關稅報復政策並無法發揮作用。同時，加徵美國產品進口關稅，其實形同對自己人民的變相加稅，會影響到人民的生活福祉。愈是對外貿易的受益者，愈是無法從進口產品加徵關稅獲益。對美國飛機、電腦晶片或者黃豆加徵關稅，都會相對造成中國經濟更爲

嚴重的損失，因爲對中國而言，這些產品的替代來源是有限的（註21）。

最後，誠如謝淑麗的分析，美中貿易戰問題的真正癥結不在貿易糾紛，而是導因於近來中國領導人在國際上的強勢作爲，美中貿易戰，是中國國力增強之後與既有霸權美國發生摩擦的序曲，這就意味著隨著中國崛起，美、中兩國似乎已經陷入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近來所說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註22）。這將使得臺灣在國安問題上面臨結構的難題和嚴峻的挑戰。

註20：南韓因部署美國「薩德」（THAAD）反飛彈系統而引起中國的不滿，澳洲則是因為支持美國南海主權的主張，雙雙遭到中國的經濟制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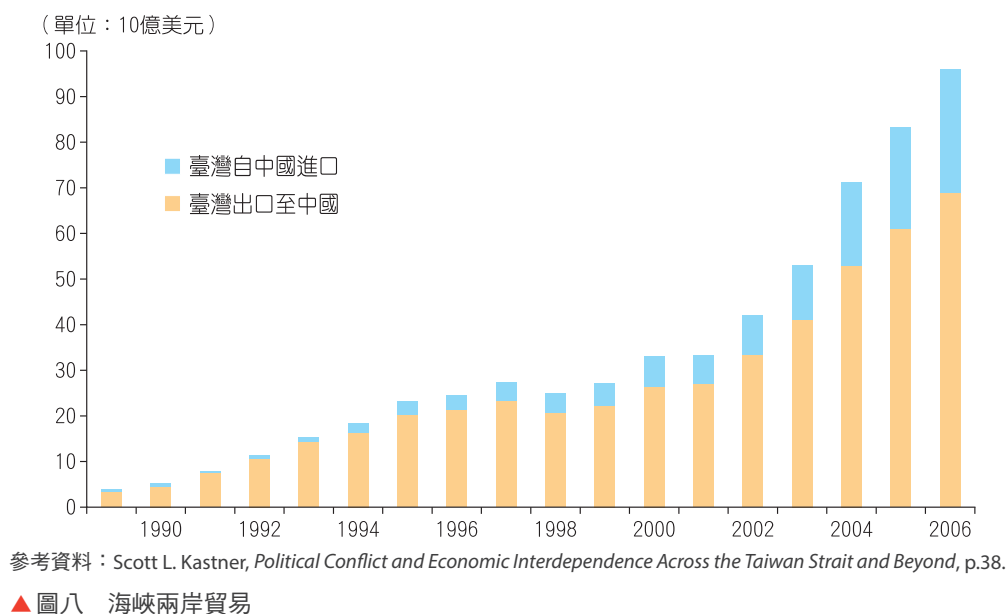
註21：Barry Naughton, "Economic Policy under Trade War Conditions: Can China Move Beyond Tit for Tat?"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57 (Fall 2018), p.1 ~ 11.

註22：Graham Allison (2017), *Destines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ese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London: Scribe Publication. 修昔底德是古希臘歷史學家，著有《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在這本分析斯巴達與雅典雙雄爭霸的書中，修昔底德斷言，造成這場戰爭的根本原因，在於雅典的崛起，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Allison 借用修昔底德的結論，探討崛起的中國，是否必然與既有的霸權美國產生衝突。

在臺灣的對外經濟關係方面，自 1980 年代末以來，海峽兩岸貿易往來快速成長（圖八），2003 年，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臺灣的最大貿易夥伴。再加上前述所提到的，臺灣廠商將生產基地轉移到中國，使得臺灣與中國在經濟上形成一種相互依賴的關係（註 23）。但是，中國從未停止覬覦臺灣的主權，臺灣在安全方面仍需要倚賴美國提供的保護。所以，從宏觀的國際結構來看，一旦美、中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不斷產生摩擦，臺灣將面臨左右為難的困境。短期而

言，截至目前為止，美中貿易大戰雙方持續叫陣，並沒有和解的跡象，以美國為出口市場的大陸臺商自然受到波及，臺灣出口到中國的產品也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受美中貿易逆差影響的大陸臺商，是否鮭魚返鄉，或者前進東南亞，值得國人密切觀察。

註 23：Scott L. Kastner（2009），*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Beyon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以上未標示之圖照來源皆為「Shutterstock」